



“毛主席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期间的合影”(前排左起第9位为草明) 吴印咸 摄

回忆我的姥姥草明

□田海蓝

在外八栋文化街五号的家中一共有六间房子,而我们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饭厅和客厅了。因为,这两间房子是我们能有机会和草明姥姥相处交流更长时间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生活道理和文学常识都是在这两个房间中从姥姥那里偏得的。

草明姥姥喜欢读书,应该说她的一生都情系书中。多年来,她以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始终保留着对所读书目的内容和人物的清晰印象和深刻的感觉。她也经常在饭桌上和客厅里与我们这些晚辈们平等地在一起讨论这些作品中的人或事:那种信手拈来的熟练,那种从容不迫的分析,那种声情并茂的描述,那种水到渠成的结论,都让我们这些小毛孩子们受益匪浅、茅塞顿开。这些谈话不但逐渐提高了我们的审美意识和理论水平,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

记得有一次,大家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忽然谈起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姥姥突然问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最后分手?特别是对女主人公丽莎这个人物,你们应当怎样来看待?”姥姥问我们的问题,出自我们看书时深深被感动的章节之一,可是这么深奥的文学论题,就凭我们几个初中生、小学生怎么答得出?所以尽管书我们是看过,可是谁也没有更深入地考虑过这类问题。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反问起姥姥来:“姥姥您先说说,您是怎么认为的?”

姥姥并没有责怪我们的唐突,她很认真地像是在和成年人交谈似地说道:“丽莎的拒绝是一种爱,离开也是一种爱,不过这两种爱都是勇于牺牲自己、真正替对方着想的爱更有道德的爱。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感动人,才有艺术魅力,才会是经典人物,因为她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俄罗斯妇女崇高而美好的形象。还有像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玛丝洛娃,都是俄罗斯妇女的美好形象……”

我们很喜欢这种平等的讨论和谈话,尽管当时还不一定完全听得懂,但毕竟让我们对原本还很朦胧的人类的爱情观问题,突然有了很清醒的新鲜认识。

在饭桌上还有一件让我们特别高兴的事情,可以经常听到姥姥给我们讲解分析电影和故事,其实这是姥姥的一种讲课方式,也是我们家里一个非常难得的优良传统。无论我们这些孩子们看过了什么小说或者电影,姥姥都会在饭桌上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感想或者看法,然后再由她来做分析总结,从而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鉴赏水平和认识能力。

当时一部英国电影《红菱艳》正在中国走红,引得我们很感兴趣,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许多,不料一直在静静地听我们说话的姥姥突然发问:“你们认为那个男主人公蒙托夫怎么样啊?”

这一回我们可是有准备的,大家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的说他过于冷酷无情;有的说他嫉妒心太强才最终酿成悲剧;有的说他的工作态度一直都很认真很敬业,简直称得上一个先进工作者;还有的说他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敢于改革芭蕾舞,从而让大胆创新的《红菱艳》一炮打响,大获成功。

而当我们终于静下心来时,却没有想到姥姥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我也很同意你们的说法,说明大家都真正动脑思考问题了。不过我以为蒙托夫还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那就是这个人特别严肃,而且严肃得十分可爱!”我们都听得睁大了眼睛,而混沌的心灵不知不觉地又洞开了一扇智慧的窗户。可惜的是,能够听到这样精彩地分析电影和小说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姥姥总是把更多的时间都慷慨无私地留给了她的工人学员们。

可是若干年后她才得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却给予这本书极高的历



草明(中)与友人在北京寓所合影(1983年)

姥在为青年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班上课:她在娓娓道来地讲述着、耐心细致地辅导着,而学员们则是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一丝不苟地记录着。这种情景和我们上课时的状况大不相同,我们的课堂上只有老师在讲课,而姥姥的课堂上却是大家都可以讲,允许畅所欲言地自由讨论。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是好羡慕这样的课堂呀!

在客厅的南面是一排有着明亮宽大玻璃窗的台面,这里是姥姥存放她订阅的各种报刊杂志的地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每每让我们大开眼界。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业余生活的最爱,是我们开拓视野、增强精神文化营养的宝库。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每当做完作业的时候就会自动跑到这里来阅读,而且一站就是大半天。姥姥如果见到了,她就会一声不响地悄悄在我们每人身后放下一个小板凳,当我们发现了非常感动时,姥姥却一脸严肃地叮嘱道:“别忘了走时要把报刊都归放整齐,别乱摆回原来的地方去!”

别看姥姥总是这么严肃,其实她还是很愿意和我们谈文学的。她喜欢听我们无拘无束地胡说八道,更喜欢听我们天真无邪地振振有词,但更多时候是我们在听她敞开心扉、袒露胸怀,其中有许多话让我们感到惊奇而且终生难忘。

姥姥告诉我们,她在初中的时候,曾经对读高尔基的作品在感觉上是很矛盾的:她喜欢《伊则吉老妻子》这一类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给她的心灵带来的那种震撼和感动,却受不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一类自传体的小说在她的心里形成的那种莫名的压抑感。她觉得这些小说中的好多内容就像是在写她自己童年的遭遇,在揭开她情感上的伤疤,让她的心又在流血。而对《母亲》她却倍感熟悉、亲切,只是遗憾自己的母亲没有尼古夫娜那么勇敢地走上妇女解放的反抗斗争道路。

她喜欢屠格涅夫小说文笔的细腻,也欣赏契诃夫小说文笔的犀利,但是却“往往读了之后感到很压抑,所以总是看看停停,停停再看看”,并且认为“假如作者还活着,我真想问问他,那些书中心人物的出路呢?”

姥姥还曾告诉我们,那時候她最不喜欢看的书是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因为小说从开篇就在写书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清晨睁开着眼睛要起床,可是小说一直写了十几页的篇幅,这位奥勃洛摩夫还是连自己的被窝都没有离开过,只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如果没有仆人的帮助,他恐怕是连自己的衣服、鞋袜也无法穿上了。姥姥说当时她并不喜欢这样冗长的慢节奏的表述方式,因而对书的思想内容也缺少了兴趣。

可是若干年后她才得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却给予这本书极高的历

史评价,说它“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40—60年代俄国封建腐朽的农奴制度逐渐被进取的资产阶级所替代的社会演变的客观过程。”这就是我们的姥姥,她是有名气、有成就的作家,在我们这些孩子们面前又是这样的率真和坦诚,不但勇于正视自己曾经的幼稚和无知,而且敢于解剖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让我们感受到相形见绌、羞赧惭愧,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不敢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几乎成为我们一生践诺的座右铭。

姥姥很喜欢普希金的抒情诗,常常在散步的时候,听我们几人朗诵普希金的名篇《海岸上旁有棵绿橡树》。诗中那些神奇美妙的童话故事让我们心驰神往,更吸引着其他路人驻足聆听。他们是否也在和我们一起分享着这份文学的快乐与感动?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却是很清楚的:就是从从此在我们居住的那条街道上,吵街骂巷的动静少了许多,而琅琅的读书声却渐渐多了起来……

因为草明是专门从事工业文学题材创作的,所以很多读者也一直都以她只喜欢写那些大气磅礴、粗犷、冰冷和坚硬的东西。其实草明也很喜欢那些短小精悍、细腻、温柔,充满了美好健康人情味儿的作品,这种审美偏好与坚定地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意愿没有冲突。

草明认为,写作需要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应该从娃娃抓起的,首先要训练孩子们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善于联想的特殊能力。本来中小学生的视野就比较狭窄有限,但是有了丰富的、巧妙的联想能力就会使孩子们有了神游世界、纵观宇宙的本领,有了天高地广、任尔驰骋的感受,有了拥抱祖国、拥抱自然的热情,有了初步的、健康的认识真善美、欣赏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我猜想,这或许应该是姥姥为什么会如此喜欢普希金优美诗歌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记得有一次,我曾把一朵在野外采撷的花儿夹进了我的日记本里。这是女孩子们常做的傻事,原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或含义,可是却让姥姥看到了,她笑着向我推荐了普希金的一首小诗《一朵小花》:我发现忘在书中的一朵小花,它早已枯萎,失去了芳妍,于是一连串奇异的遐想,顿时呵充满了我的心田。它开在何处?何时?哪年春天?是否开了很久?又为谁刀剪?是陌生人的手还是熟人的手?又为什么夹在书页里面?可是怀恋柔情缱绻的会面,或是对命定的离别的眷恋,也许为了追忆孤独的漫步——在静谧的田野,在林荫中间?可那个他抑或她,尚在人寰?



《原动力》,东北书店,1955年6月初版本



《乘风破浪》,作家出版社,1956年6月初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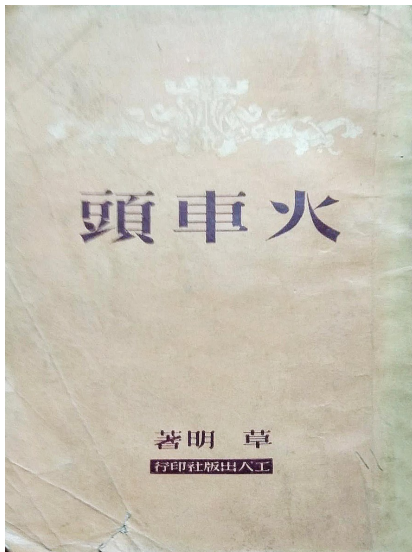


《神州儿女》,工人出版社,1957年5月初版本

如今,他们的栖身处又在谁边?或是他们早已凋谢,如同这朵无名的小花一般?

草明认为,这首小诗就好像在诗人由一朵被人遗忘在书页中的枯萎了的小花,引起了一连串关于奇异故事的命运,寄予了那么多的真诚、热情和体贴入微的关心,从而使读者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作者对生命和生活、对爱情和友情的那份执着的热爱与眷恋,对命运无常、造化弄人的惋惜和哀叹。诗人对生活的细腻感受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传达给读者的,在深沉热烈的感慨中时时表现出一种亲切的柔情和苦涩的乐观。突然间,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种脉脉温情般的亲切的感动,有了许多浮想联翩的遐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诗中两个不知名的男女主人公,开始情不自禁地关心起他们未知的命运,牵挂起他们多舛的爱情,惦记着他们可能的遭遇,更担忧着他们脆弱的未来。而这一切都缘于一朵小花的提示,让人与人之间开始愿意相互沟通、相互友爱、相互了解、相互关怀。我突然明白了姥姥的用心良苦,她在平日里从一些细微小事中培养我们富于想象、勤于联想的能力,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关心自己周围的人和世界,多用眼睛和爱心去关注我们的社会、国家和人民。

和草明姥姥在一起切磋文学艺术的写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只言片语,信手拈来,都是一些难忘的、亲切的,如涓涓细流般的教诲。她讲述的虽然只是一家之说,不一定那么宏观和权威,甚至也未必特别符合时尚和潮流,但是却成就了那么多的工人业余作者,滋养着我们这群孩子的心灵。(作者系草明外孙女)



《火车头》诞生的过程

□张思一

《火车头》,工人出版社,1950年11月初版本

今年6月15日是工业文学作家草明同志诞辰110周年,8月27日,以长篇小说《火车头》命名的“火车头工业文化广场”在草明的家乡设立,这个广场也是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暨南大学工业文学研学基地在此揭牌成立,第四届草明工业文学奖同步启动。

联想到202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镜泊湖水力发电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也建立了一座以草明的小说《原动力》命名的“原动力广场”。原动力广场占地有足球场大小,用红黄两色鲜花铺就,象征着红色基因传承的意义,广场竖立了草明的塑像,寄托着人们对草明的怀念。这一南一北两座文化广场均以一位作家的著作命名,说明了人们对这两部小说的喜悦、敬重和纪念。同时也是在纪念新中国工业文学的诞生和成长,纪念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路程上的一段艰苦奋斗历程,纪念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

回望历史,让我们重温一下《火车头》这部作品诞生的时代。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当时草明在蔡畅大姐领导下的妇委会工作。解放的第三天,草明乘坐妇委会的大卡车与东北局各部门的卡车一起进了沈阳城。当时的沈阳市是我国唯一的重工业大城市,草明暗下决心,不能放弃这个接触工人和工业的机会。她在镜泊湖的工作干得很惬意,觉得向工人学到很多东西,完成了小说《原动力》。有了这段经历,她打定主意说什么也要进工厂。草明找到时任沈阳总工会的张维祯同志。张维祯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而且在《原动力》出书的前后和草明有过很深的交往,两个人已经是好朋友。草明向他打听沈阳有些什么工厂,现在已经开工的是哪几家,张维祯跟草明说:“沈阳的工厂比较集中,较大的工厂且现在已经开工的只有三个,一个被服厂、一个自行车厂,还有就是皇姑屯的铁路机车车辆厂。”草明表示想去一家较大的工厂体验生活。张维祯建议她:“你去被服厂,被服厂现在正在加工军服,这是有迫切性的工作,而且是支援解放大军的一个工厂,你又是女同志,这个工厂的生产过程比较轻巧,你身体不太好,去这个工厂比较适宜。”但是草明不愿意,草明说:“我要到皇姑屯的铁路机车车辆厂去,因为火车对军民用也都很迫切,意义又大。”张维祯说:“你一个女同志,那个地方不是钢铁是铁,硬邦邦的,能合适吗?”草明坚持:“我做不了这个重体力活儿,去做思想工作还不成吗?我在哈尔滨就接收过邮政局,熟悉工人的情况。工人们需要了解共产党,他们受了14年的奴役与奴隶教育,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他们,也从他们那里学习我缺少的东西。”张维祯相信草明的坚定意志,同意她先试试。草明又去找当时沈阳第一任市委书记陶铸同志,申请去工厂,陶铸说:“蔡大姐回来要人怎么办。”草明答应:“要我我马上回去。”陶铸这才批准。

草明到皇姑屯机车车辆厂时,工厂刚刚被接收不到十天,共有南北两所铁路工厂,她在的这边是北厂,有十几个车间勉强开工。工人的思想还不稳定,生活问题也多。草明负责工人思想工作和工会组织工作。她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给工人发放救济粮。工人们高兴地扛起粮袋,眼里充满对共产党干部的信心和期待。头一天,工人就主动和草明打招呼、聊天。草明和工人相处了一段时间,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工人后,工人们把自己的心里话、担心的问题、遇到的困难都向她毫无保留地袒露出来。草明发现,受了14年奴役的东北工人像蒙上一层灰尘的金子一样,只要轻轻一吹,去掉灰尘,便金光闪烁。

1949年2月,蔡畅大姐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从法国回到了沈阳。草明就回到妇联,准备跟蔡大姐讲自己想要离开妇委会到工厂去工作,但是因为蔡大姐一直非常倚重、信任草明,她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草明有点儿不知如何开口。当天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时蔡大姐把自己出国的貂皮大衣给她盖上,以为她是冷得睡不着,草明又怕蔡大姐冷,悄悄地把大衣盖回去。蔡大姐这时候明白了草明睡不着觉的原因,就对她说:“你就在工厂干下去吧,写吧。写工人是挺好的,外国作家也有不少人写工厂

的,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受压迫的,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是受尊重的,是国家的主人。你不是写了《原动力》吗?听说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都看过,都认为很好,你就写吧,如果有机会再写女工就更好了。”草明备受鼓舞,想起接触过的邮局老邮工、镜泊湖的邹师傅,过去工人阶级受苦受难,今后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扬眉吐气,发挥无穷的潜力了。第二天草明高高兴兴地回到工厂去,刚到工厂,石厂长就告诉她:“工人们真了不起,利用休息时间抢修一台机车。”草明很惊讶,想到这些天正在动员献器材,因为一辆机车需要很多材料,要修复一台机车,备件这么快就凑齐了吗?一位小伙子跑来兴奋地说:“我们准备修个火车头送解放军去解放北平。”老工人宋师傅解释道:“我们看部队急需进关,利用业余时间赶修了一台火车头。”老宋领着人组成一个“死车复活小组”,在一座废料堆那转了好几天,找出那些旧材料修机车。老宋又说:“日本人在时,我们一不高兴,把六成旧的火车头给报废了,实际上可惜得很,现在工厂是我们自己的了,我想到不久解放军要用,我们提前好好整整修。这台车缺的零件,从那些车上找补,七凑八凑,一台新的机车就能出来,你放心吧。”草明听了以后,觉得工人真是有远见、有智慧,他们对祖国忠心耿耿和奉献精神非常让人感动。工人阶级是伟大的阶级,是国家的栋梁,草明决心一辈子在工业战线上向他们学习。

维修刚开始时,只有七八个老工人在搞,后来大多数工人都知道了,积极参与进来。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不肯回家,夜晚就在地铺上铺一件衣服在木板上睡觉。这个车间里面的车工、钳工、铆工、焊工、电工,都动员起来了。花了13个昼夜,一辆崭新的银光闪闪的“北平号”(这是他们给新机车起的名字)落成出厂了,为了大军进关,打到北京去。落成那天为了庆祝这件事,按照惯例燃放鞭炮,还杀了两只肥猪给大伙改善。各车间的墙报换上红纸,把最激动最欢快的字句写上去。草明当时想到第一时间要开个总结会,打电话给《东北日报》的记者,请他们来参加,因为她觉得这件事情意义重大。这件事不仅表现了工人的觉悟,也体现了工人阶级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精神,应该及时报道,唤醒更多的人积极奋发起来。《东北日报》派了两个记者来,他们被工人们的义举感动了。大伙一开会就争先恐后地议论起来,有人说日本人耗尽了中国的资源,有人说工人阶级有办法对付他们,有人说修车时谁比较拼命、谁献车灯、谁技术过硬等。最后大家归结到一句话:“有了共产党的好领导,让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发挥了爱国爱党爱国精神,就什么事都能办到,赴汤蹈火也不难。”后来,皇姑屯铁路工厂的工人又加修了一台机车,命名为“南京号”,意思是运送大军南下,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1949年3月,草明作为东北妇女代表团的代表进京,3月25日一早,邓颖超大姐对妇女代表们宣布:“今天隆重举行正式的入城式,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检阅。党中央批准我们全体女代表随中央的行列一起参加。”检阅后,毛泽东下车看望检阅队伍,一一和大家握手。妇女代表分两排站列,小个站前排,草明个子矮站在第一排,毛泽东走过来,发现了她,和她亲切握手,说:“哦,你也来了。”参加完进城仪式后不久,草明一回到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工人们就把她围了起来,非要她讲讲入城仪式中检阅部队的情况。人民热爱领袖,热爱伟大的党,热爱伟大的祖国之情溢于言表。

在此期间,草明收到毛泽东托人转来的一封信,说他看了草明的《原动力》、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非常感动,还落了泪。草明看信后受到极大的鼓舞。此后,草明用了5个月时间,完成了以沈阳皇姑屯铁路机车厂工人的光辉举行为内容的书稿。

恩格斯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草明就用火车头三个字作为书名。1950年11月,长篇小说《火车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这本书创作的全过程。(作者系鞍钢博物馆馆员、草明重外孙)